

在資本主導的社會中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憲政的基礎；消費促進經濟增長，旨在尋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。任何違背利益最大化的社會行為，都會被視為「非理性」的行動。基於這一前提，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無論是聯邦制還是直接民主，都無法支撐世界共和國的梦想。

# 聯邦主義與民主政治

黃鳳祝

自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，圍繞危機的解決方案，歐洲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大討論。歐洲思想界則試圖從歐盟政治架構改革的層面，探索歐洲的未來。繼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的「超國家民主」、法國哲學家巴里巴爾（Étienne Balibar）的「歐洲聯邦」之後，德國政

治學家烏爾里克·格羅（Ulrike Guerot）提出了「歐洲共和國」（Europäische Republik）的理念。在新作《為什麼歐洲必須成為一個共和國》（Warum Europa eine Republik werden muss）中，針對歐債危機以來歐洲社會的分裂局面以及極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，格羅提出了建立歐洲共和國的解決方

案。這部著作甫一出版，即被譯為法文、意大利文和波蘭文。早在二〇一三年三月，格羅就曾與奧地利作家羅伯特·梅納瑟（Robert Menasse）共同發表《建立歐洲共和國的宣言》。二〇一四年九月，格羅發起成立「歐洲民主實驗室」，致力於創建「歐洲共和國」，並且把二〇四五年作為實現這一政治烏托邦的時間節點。

## 唯共和政體能實現永久和平

與「超國家民主」和「歐洲聯邦」一樣，「歐洲共和國」這一理念植根於康德有關世界共和國和世界公民的理想。在《永久和平論》一書中，康德指出，民主政體並不能引導世界走向和平，唯有共和政體才能實現永久和平。此外，格羅的「歐洲共和國」，還受到柏拉圖的《共和國》、西塞羅的《論共和國》和孟德斯鳩《論法的精神》的影響。

在康德看來，基於法治精神的共和政體是人類所能達到的最完美的國家制度。世界上的制度形式可以分為兩種：一是命令統治形式（forma imperii），二是行政治理形式（forma resinis）。統治形式具體可以分為三類：一人統治（王權政體）、寡頭政治（貴族政體）和民主政治（民主政體）。按照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理

論，正面的政治形式有可能轉變為負面的政治形式，例如王權統治可以轉變為暴君專制，貴族統治可以轉變為財閥專制，民主統治可以轉變為暴民政治。西塞羅也把共和分為三種類型：君主共和、貴族共和與人民共和。人民共和與民主統治的區別是：共和是一種法治的體制，民主則是一種專政的體制。康德認為，只有建立共和政體，即把命令統治形式轉變為行政治理形式，才有可能避免專制統治。

一個國家的政治危機，大多是源自制度設計的危機。在建構某一組織或某法律條文時，人們往往只關注眼前問題，而無法預見這種建構對未來社會發展的影響。

英國退歐與特朗普上台，促使歐洲社會對歐盟現有的政治體制進行反思。二〇一七年七月出版的德國哲學雜誌《高風》(Hohle Luft)，發表專文探討美國的聯邦制及其對歐洲的啓示。十八世紀八十年代，美國在制定憲法的過程中，針對直接民主制度還是共和制度曾經展開一場政治大討論，與之相關的八十五篇評論文章後來結集成書，也就是《聯邦黨人文集》。隨着歐洲危機的疊加，這部著作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。美國在建國之初，實行直接民主並不現實，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三權分

立的兩院共和制：由總統執掌行政，參眾兩院主持立法，法院負責司法事務。互聯網的普及使直接民主成為可能，立法權可以經由全民投票來解決。

### 格羅尋求的「基督教共和國」

馬克龍勝選，為歐盟克服政治危機提供了新的契機。為了推動歐盟改革，德法有意在歐盟政治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方面達成妥協，具體包括：一、在安全政策上，建立共同的軍事合作機制，在布魯塞爾建立歐盟的軍事總部；二、在歐元區設立歐盟財政部，統籌歐盟的財政計劃；三、建立歐盟檢察院，統籌歐盟的執法機制；四、制定歐盟採購法案，對成員國政府採購行為進行規範，歐盟產品享有優先權；五、建立統一的歐盟選舉法，賦予歐洲人民平等、自由的直接選舉權。這些改革措施有助於歐盟從現有的「邦聯制度」過渡到「聯邦制度」，避免再次發生類似英國脫歐的分裂事件。

格羅尋求建立的政治烏托邦，沒有具體的地理邊界，而是基於共同的文化信仰，也就是一個由精英管理的「基督教共和國」(Les Republic Christiania)。作為歐共體的創始人之一，戰後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提出用基督教的道德理念統一

歐洲。歐盟東擴之後，這一帶有「大歐洲民族主義」色彩的價值觀一度淡化。德國哲學家尼達—魯莫林(Julian Nida-Rümelin)在探討統一歐洲的身份認同時，提出構建超越宗教信仰的歐洲價值觀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格羅的基督教共和國是對歐洲難民危機的一種反應，也是對奉行文化多樣性的歐洲夢的一種反動。

在資本主導的社會中，文化消費是多元的，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社會文化擁有多元性。法國哲學家巴里巴爾認為，唯一的真正的民主主權應該是一種共享主權，隨着共同權力的增長，歐洲民眾將獲得新的行動力。在他看來，只有聯邦制才能拯救歐洲，片面要求更多的國家主權只會加劇歐盟內部的社會分化。但是在資本主導的社會中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憲政的基礎；消費促進經濟增長，旨在尋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。任何違背利益最大化的社會行為，都會被視為「非理性」的行動。基於這一前提，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無論是聯邦制還是直接民主，都無法支撐世界共和國的夢想。

(作者為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。)

◎